

第 四 卷

民国著名 人物传

宋嘉澍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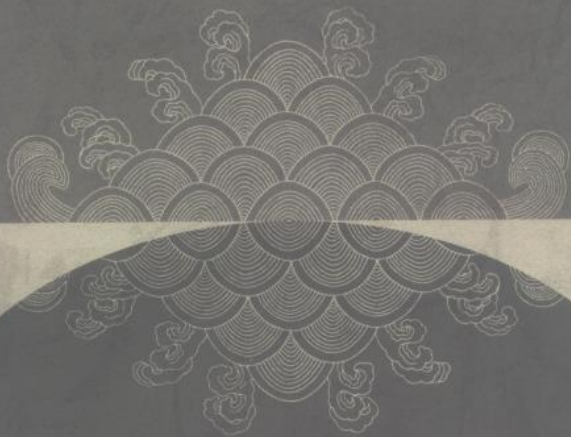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

四

卷

民国著名人物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著名人物传(4)/宋嘉沛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1
ISBN 7-5006-2501-4

I. 民… II. 宋… III. 名人-传记-中国-民国(1912~1948)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42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27 印张 2 插页 600 千字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30.80 元

序

李 新

《民国著名人物传》(四卷)是一部收录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界著名人物的传记集。我想,这不仅是了解这些人物生平事迹的一部好书,也是了解新中国昨天历史的一部好书。

研究中华民国史,具有重要的意义。重视历史,以史为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优良传统。1972年,当我们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时,经过讨论,我们认为,民国史应与党史、革命史有所分工,民国史应当主要写统治阶级,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消灭;封建主义怎样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怎样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旧民主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主要写统治阶级,是因为统治阶级确定了那个时期历史的主要特征。

既然要写统治阶级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在讨论民国史编写计划时,就确定要编《中华民国人物志》,给1000人写传记,将4000人列入民国人名词典,另外编制若干人物表。这也是我国两千年来历史学的优秀传统之

2637/04

一。如今，我们从1000人中选出160人，写出一些较详细的传记，无疑会对民国史研究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打开二十四史，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历史学历来的传统是，既为开国元勋、名将大臣立传，也为奸臣、酷吏、儒林、游侠等各色人物立传。的确，我们从这些人物传记中，看到了生动、具体、多方面的历史真实，这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不仅要研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也要研究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对他们都应该实事求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分析研究，而不能简单地扣上好或坏的帽子。孙中山是民国开国元勋，一生为民族独立富强而奋斗，但也有他的局限性；蒋介石专制独裁，反共分裂，但他在北伐与抗日中的表现，应当根据史实给予评定；即使是最后沦为汉奸的汪精卫，他在早年反清革命中的行动，也应有恰当的地位。只有这样，历史人物的真实事迹才能得以如实地表述，历史的发展才能得到全面地展示，历史才能写得具体、详实、生动、丰富，才能给后人留下一幅历史的真实图画。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史学界一片兴旺景象，尤其是历史人物的研究，更可以称得上异常繁荣。回顾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出版时，在国内外颇引起一番震动，印数达15万册。因为在那之前的20年间，没有人敢为民国时期的所谓“反面人物”“树碑立传”。所以，《民国人物传》的问世，被海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认为是冲破了一个禁区，是大陆历史学研究进入新时期的标志之一。应当指出，那本书所收录的几十篇传记，是我们1972年后开始研究民国史数年中结出的第一批果实，而那一时期，正是极“左”思潮泛滥之时，所以大家虽然力图冲破各种框框的束缚，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地记述人物，但是今天看来，其中仍然有许多时

代的印痕而不能尽如人意。然而，它毕竟为新时期的人物研究开风气之先。此后，各种各样的传记著作纷纷问世，犹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

近些年来，民国人物传记出版不计其数。许多学者深入而广泛地发掘史料，对人物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作出公正客观的评判。这些传记中不仅有创立民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也有从民国总统到洪宪皇帝的袁世凯，统治中国22年最后流落到了台湾的蒋介石；不仅有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也有民主进步人士“七君子”和著名学者蔡元培、胡适；不仅有工商界的张謇、荣氏家族，也有“海上闻人”黄金荣、杜月笙，还有堕落为汉奸的汪精卫、陈公博……甚至一个人物有数本以至十几本传记问世，确实是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人物传记写作如此繁荣，说明了一个事实，读者需要传记史学。确实，一本人物传记，就是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写照。人们可以从中激励意志，获取知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它给读者的教益是无穷的。

历史人物研究近十几年来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我认为可概括为一句话：摆脱了极“左”观念的束缚，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对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客观公允的评价。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时，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看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起到了促进还是阻碍作用。如是前者，我们应该肯定；如是后者，我们应该给以恰当的

批判。带着感情色彩评判历史人物，往往会出现偏颇；用今天的立场要求前人，也不公道。

我们强调将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体考察分析，绝不是说可以不顾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去片面、静止、孤立地强调历史背景。我们摒弃了好与坏之间绝对化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将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是非再去颠倒过来，甚至把错误说成正确，罪过说成成绩，这绝不是实事求是。

现在大家对实事求是已经说得很多了，但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最起码也是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必须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苦功夫。从事历史学研究，凭臆测、想当然，是最要不得的；带着成见去取舍史料，顺我者存，逆我者弃，也是很危险的。如果因循沿袭，书上已经写了，前人已经讲了，自己就不去发掘史料重新认识，甚至不加分辨地跟着走，就会以谬传谬，贻误读者。如果根据一枝半叶、片言只语或者不可信的甚至被篡改过的史料，轻率地作出重大史事的结论，也是不严肃的。说到底，这都是不肯下苦功夫。人们常说实事求是需要勇气，我说更需要毅力，要肯下苦功夫。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真知灼见，也才能勇敢地拨乱反正，提出实事求是的见解。否则，那种勇气就缺乏坚实的基础，也就不是实事求是。

令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的上述看法，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近十几年来的历史人物研究，已经扫除极“左”思想的束缚，走出形而上学的死胡同，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在历史长河中搏击的各种人物，他们的经历往往是曲折多变的。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受到近百年来剧烈的社会变动和政治斗争的影响，许多人的经历功过杂陈、瑕瑜互见。用好人或坏人、革命派或反动派来概括，往往失之

过简。他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各种不同条件下的言行，需要分别不同的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我们写历史人物的传记，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出发。历史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相比较而存在和发展的，我们提倡对历史人物在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中的不同表现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条理出他的思想脉络来。

实事求是已经蔚然成风，但是我们仍要不断警惕和防止“左”的顽症和形而上学的习俗。我们要把历史著作写得真实可信，一时说不清楚的问题宁可写，也不要以讹传讹。

我已经年近八旬，没有精力阅读这套丛书的全部传稿，但是我了解到参加撰写丛书各篇传记的作者，都是对所撰人物有相当研究和见地的，其中有不少作者已经写出几十万字的传著问世。他们占有丰富资料，有多年研究的积累，又汲取了近几年来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写来不仅可信，并且不乏一家之言，文字也力求清新可读。可以预期，这是一部具有相当水平的传记著作，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然，这是一部多人撰写的传记合集，几位主编同志又力求保持各位作者的不同风格，所以难免参差互见。鉴于民国人物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和提高，丛书的作者和编者表示将虚心听取各界的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修正，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几位主编要我写一篇前言，我就写了以上这些，作为对这件有意义的事的一种支持。

1996年9月

目 录

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蔡元培	周天度、韩荣芳 1
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知识界领袖——胡适	耿云志 21
中国新文学的旗手——鲁迅	陈漱渝 55
两代间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巨人——梁启超	耿云志 79
阐旧邦以辅新命——哲学家冯友兰	潘 平 109
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梁漱溟	马 勇 129
有志于政的科学家丁文江	耿云志 151
学术大师王国维	耿云志 172
学有专精,行有令名的陈寅恪	胡守为 189
“近百年最值得尊敬的学者”马寅初	汪仁泽 209
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一生	熊尚厚 232
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教育家张伯苓	宗志文 245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规划者蒋梦麟	刘敬坤 264
致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罗家伦	刘敬坤 284
教育先驱者梅贻琦	黄延复 304
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茅盾	林印 颜平 334
幽默大师林语堂	汪仁泽 苏宝泉 350
人民艺术家老舍	傅立沪 380
新月派的代表徐志摩	高维良 396

南社诗人·国民党左派柳亚子	杨天石	416
戏剧改革家欧阳予倩	郑一奇	440
承前启后的京剧大师梅兰芳	林印 李仲明	453
一代艺术大师齐白石	高维良	464
大器晚成的画家黄宾虹	王伯敏	483
纵笔行千里,奇裁张大千	沈 宁	503
融会中西的杰出艺术家徐悲鸿	郑一奇	520
数学巨匠华罗庚	邢 岩	538
地质力学的创立人李四光	杨世铎	561
我国近代地理学开创者与气象学奠基者竺可桢 ...	刘敬坤	580
爱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李希泌	609
水利专家李仪祉	娄献阁	625
我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侯德榜	熊尚厚	639
杰出的华侨生理学家林可胜	陈 民	658
饮誉世界的疫防斗士伍连德	陈 民	666
新闻出版战线上的英勇战士邹韬奋	宗志文	674
爱国报人张季鸾	朱西昌	699
中国新式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	郑一奇	718
出版企业家王云五	熊尚厚	735
中国近代佛教奠基人——太虚法师	潘 平	756
红衣大主教于斌	浦鞍平	780
伴随时代前进的马相伯	娄献阁	794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宗志文	817
爱国民主斗士闻一多	闻黎明	836

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

蔡元培

周天度 韩荣芳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特别是五四前后，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民主办校等一系列革新措施，对北大进行大力整顿和改革，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同情学生爱国运动，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作为中国近代知识界的卓越先驱，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从翰林学士到资产阶级革命家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绍兴位于钱塘江南岸、会稽山北麓的浙东平原，这里山明水秀，美丽富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曾孕育了为数众多的政治家、书画家和学者文人。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就诞生在这人杰地灵的绍兴城里。他家世代经商，祖父曾任当铺经理，父亲当过钱庄经理。蔡元培弟兄三人，惟有他自幼聪颖，酷爱读书，父亲对他着意培养，延聘塾师来家中课读。他11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母亲周氏，克勤克俭，典卖首饰，抚养稚子成人，并经常以“自立”和“不依赖”勉励他们。^①父母亲的言行，对蔡元培的性格有很大影响。他一生勤奋，为人宽厚和不苟取，就是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

默化下养成的。

父亲去世后请不起家庭教师，他便到别处附读。由于家贫不能经常点灯，他便借炉灶火光映照夜读。一次，他在楼上读书，宅中起火，举家惊慌，疾呼他下楼，他因全神贯注于书本，竟然全不察觉。由于勤奋攻读，1883年蔡元培一举考中秀才。1889年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赴京城会试，又中为贡士，只因过早离京返乡，没有参加殿试。3年后补行殿试，得中为第二甲第34名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升翰林院编修。年仅27岁的蔡元培，已是一名才思横溢，“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②的士大夫了。

正当年轻的蔡元培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时候，清王朝却由于外国侵略者的一再打击和它自身的腐朽，正处于风雨飘摇日趋没落的过程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订立了《中日马关条约》；1900年义和团运动遭到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又与各国签订了《辛丑和约》。从此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处于被瓜分的局面。蔡元培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幡然觉醒，摆脱仕途，走向革命。在康有为、梁启超变法高涨的年代，他已深受新思潮的启蒙和激荡，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同情者。戊戌政变失败后，他“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③。1898年冬，他回到故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即校长）。这是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萌芽，也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1902年蔡元培与叶瀚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他被推举为事务长（即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④，是20世纪初年国内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蔡元培的革命活动是由此开始的。以教育为手段，通过办学来提高国民的民

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培养革命人才,是蔡元培的基本思想。教育会成立不久,即创办了一所爱国女学,蔡元培出任校长。该校随后就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继爱国女学成立之后,蔡元培和教育会其他成员为了接纳南洋公学学潮中的退学学生,又创办了爱国学社,他又被推选为学社总理。爱国学社成立后,在蔡元培等激进分子领导下,开展了革命的宣传活动,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蔡元培还和吴稚晖、章炳麟等在《苏报》上连续发表鼓吹反清革命的评论文章,“崇论横议,震撼一世”^⑤。

1903年春天,中国教育会与东京留日学界紧密相呼应,在上海开展了拒法、拒俄运动,蔡元培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还创刊了《俄事警闻》,专门登载俄兵侵犯满洲的消息,和抨击清政府外交的失败,以唤起国人注意,旨在通过反帝爱国的宣传,激发人们的反清革命意志。

蔡元培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由于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他思想上侧重于暗杀。1904年,东京留日学生杨笃生、何海樵等秘密成立暗杀团,谋刺清廷首要,并回国进行活动。蔡元培得知后,便参加了暗杀团,并在上海亲自赁屋学习制造炸药。是年冬,他与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一起,将暗杀团改组,创立光复会,并被推举为会长。光复会一成立,蔡元培即将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和徐锡麟介绍入会。光复会是东南地区反清革命斗争深入的产物,它的成立,对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被吸收参加了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

1906年秋,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他感到革命一时成功无望,切望能有机会到国外学习。1907年孙宝琦奉命出使德国,蔡元

培托人说情表示愿在驻德使馆中任职，一面读书。孙宝琦答应了他半工半读的请求，于是他便随同孙一道去了德国。

二、民国初年的教育实践活动

武昌起义胜利后，蔡元培结束了他在德国的工读生活回到上海，在新生成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里担任了教育总长。在他的具体领导下，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旧学制作了重大改革，主要内容有：改学堂为学校；小学废止读经；各科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初等小学男女同校；中学文、实不分科；废止旧时奖励出身等。为了普及教育，他极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教育部内设有社会教育司，由教育部通令各省推行社会教育，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1912年2月，他写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为今后的教育方针。文章否定了前清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最重要的两条，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⑥，从而打破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两条不可动摇的信条。他首倡德、智、体、美四育，为民主共和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是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一个纲领，体现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和民主精神，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对民国以后的教育，影响关系甚大。

针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积弊和革命后一些军政人员私德不修，缺乏民主共和思想素养，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进德会”。随后他又和宋教仁等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阐明宗旨在

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社会之条件，列举改革社会上种种恶习，提出不狎妓、不置婢妾、不赌博、破除迷信、为官不受馈赠等等共 36 条，旨在通过这一组织的提倡为新的民主共和国社会树立新风。

1912 年 2 月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推荐袁世凯继任，并派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北上欢迎袁世凯来南京任职。袁世凯不愿离开封建帝王老巢北京。忠厚存心的蔡元培被狡黠奸诈的袁世凯所蒙骗，对袁一手导演的京、津、保地区“兵变”信以为真，同意袁在北京就任大总统。随后，蔡本人不得已在袁世凯的北京政府里当了 4 个月的教育总长，终因对袁及其在内阁中的党羽们的阴谋权术十分不满，耻于为伍，于同年 7 月辞职南归。9 月间他携妻儿从上海乘轮赴德国，再次到莱比锡大学听课，并从事世界文明史的研究。

1913 年 3 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遭暗杀身亡，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孙中山电召蔡元培回国共商对策。蔡元培主张反袁，但在方法上不赞成孙中山提出的武力讨袁，而想通过调解来解决南北方的冲突。调停不成，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袁世凯专制。袁世凯一心想消灭南方国民党势力，以实现他反革命统一和实行帝制的野心。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再次流亡国外。蔡元培也再次赴欧，去法国留学。

蔡元培两次留学欧洲，看到西方科学技术十分发达，成功地建立了现代化国家；而环顾祖国极端落后，因此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反对闭关自守，无知自大。在法国期间，他与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和吴玉章等人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民国初年他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发展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和更

好地将法国文化科学介绍到中国来，他们与法国有关方面人士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中国方面的会长。其主要任务，一是从国内招收华工，一是在法国开办华工学校。蔡元培为华工学校编了德育和智育讲义共40篇，并亲自讲授。讲义包含某些有价值的哲理和积极的辩证法因素，对人们有启迪作用。留法勤工俭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新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创造的一种新形式。它在五四前后有很大发展，为国内许多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到法国求学，提供了方便，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对社会起了有益的作用。

三、整顿改革北京大学

1916年，袁世凯因实行帝制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反对，愤愤而亡，黎元洪继任总统。蔡元培应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之聘，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个全国最高学府的官僚腐败习气是出了名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立即对学校大力进行整顿和改革。他首先面向学生，着重注意改变他们科举时代的旧观念。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因此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⑦。为了转变学校的风气，引导学生对读书和研究学问发生兴趣，他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

一、充实教员阵容，吸收进步学者。蔡元培到北大后不到10天，就聘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连同把陈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移到北京来办。继陈独秀之后，又

聘请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派学者来校任教，加上原有教员中本已启革新端绪的沈尹默、沈兼士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营垒。理科和法科的教学力量也作了调整，聘来不少著名学者，解聘了那些不称职的教员；特别是法科方面，辞退了不少实为政府官吏的所谓兼职教员。

二、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陈规，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真正发展的。他还认为学术上的不同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每一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该让他们并存，使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在北京大学的教员中，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士，也有思想上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各派学者在学术上各抒己见，展开争鸣，使学校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从而开创了一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新风。

三、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他的领导和赞同下，北大校园内各种学术团体和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到1919年初，成立的各种团体有20余个，打破了改革前沉闷和颓废的局面，学术讨论和思想争辩蔚为风气，学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四、学制和体制改革。在学制改革方面，第一步，扩充了文理两科，增设史学门和地质学门；法科准备独立，商科归并入法科；工科与北洋大学合并，预科改属本科。第二步，撤销文理科界限，将各科所属的专业一律改称为系，学长制也因之废除。第三步，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大学本科应学满80单位（即如现在的学分